

中国农村合作经济

Zhonggu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史/王贵宸编著.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6.8

ISBN 7-80636-847-7

I. 中... II. 王... III. 农村经济: 合作经济—经济史—中国 IV. F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2037 号

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史

编 著: 王贵宸	网 址: www.sxskcb.com
责任编辑: 赵建廷 张 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复 审: 王宏伟	承 印 者: 太原红星印刷厂
终 审: 赵建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出 版 者: 山西经济出版社	印 张: 38.5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字 数: 600 千字
邮 编: 030012	印 数: 1—2000 册
电 话: 0351—4922220(发行中心)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0351—4922085(综合办)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E-mail: Fxzx@sxskcb.com (发行中心)	定 价: 58.00 元
Web@sxskcb.com (信息室)	
Jingjshb@sxskcb.com (综合办)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篇 导论

第一章 历史遗产	(3)
第一节 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	(4)
第二节 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	(14)
第三节 大一统的中华文化	(25)
第二章 土地改革	(40)
第一节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过时的土地制度	(40)
第二节 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41)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主张和实践	(47)
第四节 几点思考	(77)
第三章 合作思想	(82)
第一节 合作思想	(82)
第二节 合作社的原则及其修订	(89)
第三节 西方国家的合作运动	(94)
第四节 特殊条件下的基布兹(KIBUTZ)	(101)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	(111)
第一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思想	(111)

第二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业合作的理论	(114)
第三节	列宁的农业合作制理论	(124)
第四节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	(134)

第二篇 新中国成立前

第五章	旧中国的农村合作	(143)
第一节	近代合作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43)
第二节	中国的早期合作运动	(151)
第三节	国民政府支持下的合作运动	(153)
第四节	地方政府支持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156)
第五节	“中国工合”创办的合作社	(158)
第六节	旧中国农村民间自发的换工互助	(165)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农村合作	(172)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合作	(172)
第二节	中央苏区的农村互助合作	(174)
第三节	抗战时期边区和根据地的农村互助合作	(183)
第四节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时期的 互助合作	(190)
第五节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供销合作、信用 合作等合作社	(197)

第三篇 合作化、集体化

第七章	互助合作的第一次争论和第一个决议	(205)
第一节	中共东北局的报告引起的分歧	(205)
第二节	要不要把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争论	(210)

第三节	第一次争论引出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	(222)
第四节	关于农民两种积极性的论点	(226)
第八章	恢复时期的合作社经济	(230)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 合作社的论述	(231)
第二节	恢复时期农村合作事业及供销社的发展	(235)
第三节	恢复时期农村信用社的试办和起步	(239)
第四节	恢复时期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	(242)
第五节	结束语	(252)
第九章	与农业集体化有关的三个问题	(255)
第一节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	(255)
第二节	中国的工业化	(264)
第三节	关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	(268)
第十章	中国农业集体化	(278)
第一节	加速农业合作化的准备	(278)
第二节	反冒进——批判“反冒进”	(281)
第三节	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	(296)
第四节	实现了供销合作化和信用合作化	(325)
第五节	政府加强了对农业的控制	(332)
第六节	集体化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	(335)

第四篇 人民公社

第十一章	“大跃进”	(343)
第一节	“大跃进”在酝酿中	(344)
第二节	1956 年的反冒进	(346)
第三节	毛泽东批判反冒进	(352)

第四节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浮夸风盛行	(360)
第十二章	人民公社化运动	(371)
第一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	(371)
第二节	人民公社化后的初步调整:三级所有,以大队 为基础	(390)
第十三章	从纠“左”到反右倾、到三年灾难	(408)
第一节	从轻松地有限纠“左”,到无情地反“右倾”	(408)
第二节	八中全会做出错误决定	(424)
第三节	反右倾运动及其灾难性后果	(426)
第四节	被迫退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434)
第十四章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443)
第一节	“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 人民公社制度	(443)
第二节	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升级”与调整	(450)
第三节	人民公社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	(457)
第四节	对高度集中统一体制下的“农村合作经济”的 评论	(462)
第十五章	阶级斗争为纲下的“农村合作经济”	(467)
第一节	农村的“四清”运动	(467)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乱了中国,更乱了农村	(482)
第三节	农业学大寨、大寨县运动	(488)
第四节	供销社和信用社的再“升级”	(497)
第五节	阶级斗争为纲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504)

第五篇 改革

第十六章 家庭承包制导致人民公社解体	(509)
第一节 农村经济改革是通过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 形式开始的	(510)
第二节 包干到户导致政社分设公社消亡	(527)
第三节 农民不断探索的结果	(533)
第十七章 市场经济体制取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556)
第一节 农村经济改革的目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557)
第二节 家庭承包制的改革深化:塑造农民家庭 经营市场主体	(563)
第三节 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566)
第四节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合作基金会的兴废	(571)
第五节 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与改革	(579)
第十八章 新世纪的展望	(592)
第一节 关于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几点看法	(592)
第二节 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	(594)
第三节 供销合作社改革任重道远	(597)
第四节 加快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步伐	(599)
第五节 乡村集体企业的改革目标:政企分开, 适应市场需要	(600)
专家鉴定意见之一	(602)
专家鉴定意见之二	(604)
后 记	(606)

前 言

关于《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史》一书,编著者特作以下说明:

(一)本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的资助。课题从立项到实施,得到了院老干部局的精心组织和对研究的支持。课题完成后,听取了所内一些同志的意见,又看了一些资料,对《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史》书稿做了进一步修改。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管理重点学科项目的成果之一,特别得到我所领导和山西经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此书才得以出版。这里还要提出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郭书田教授和张庆忠编审在百忙中审阅了本研究成果,并做出鉴定,给予肯定。在此,编著者深表谢意!

(二)一部完整的《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史》应当包括中国所属的地域。即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但是由于编著者对台、港、澳的合作经济研究不够。因此,本书主要讲中国大陆的农村合作经济。

本书的时间跨度,是从合作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特别从1921年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始,到20世纪末为止,历时79年。而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农村合作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无需讳言,也走了一段相当大的弯路。自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到20世纪末取得了很大进展。本书记录了农村合作经济走过的曲折道路和改革过程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编著者力求忠实于历史,反映历史本来面貌,但又不能不反映编著者

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判断。

编著者深知,现在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得到大家认同的《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史》。这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课题,有待于学术界和实际部门的共同努力。编著者愿意把这本书作为引玉之砖。希望能够引起大家讨论、研究、再讨论、再研究,总是会成功的。

(五)基于这种想法,本书尽可能多地使用一些资料,目的便于同行的参考,也便于同行了解编著者所作结论的论据并做出自己的判断。

(六)合作经济是资本主义进入产业革命以后,生产社会化的产物。这是一种世界现象。从合作经济思想传入中国到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受到了各种合作经济理论的影响。所以本书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也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还介绍了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曾经存在的各种合作经济思想流派。

在本专题的研究过程中,编著者深切地感到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还受到了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例如“一言堂”、“家长制”、少数干部说了算、官本位、官商作风等等,所以,本书单设一章介绍新中国所接收的历史遗产。

(七)本书共分五篇十八章:

第一篇:导论。含1~4章,历史遗产、土地改革、合作思想、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它们都影响着中国农村合作事业。

第二篇:新中国成立前。含5~6章,主要讲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合作社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农业互助与合作。

第三篇:合作化、集体化。含7~10章,主要记录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供销社化、信用社化的发展过程开始走上曲折之路。

第四篇:人民公社。含11~15章,从人民公社化,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又经历了农村“四清”、“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和“建设大寨县运动”。

第五篇:改革。含16~18章,农村经济改革:包产到组、到户,包干到户,政社分设,人民公社消亡及新世纪的展望。

(八)本书的基本思路:

——农民家庭经营适合农业生产的特点,在家庭经营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家庭经营会长期存在。

——家庭经营也有局限性,需要发展产前、产中、产后的合作加以弥补。

——在保留家庭经营的条件下,组织的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必须坚持国际上通行的自愿、互助、互利、民主、公平、团结的原则,尊重社员的退出权。

——农民组织的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实质上是股份合作制,合作经济组织是社员集资建立的,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属于各该组织的成员。要确认和维护社员的民主权利和经济权益。

——我国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以及供销社、信用社的“升级”、“过渡”,最大的问题是搞了“归大堆的集体”和供销社、信用社的“升级”,也就是剥夺了农民,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普遍性的消极怠工现象。农业增长缓慢、农民生活水平低下。农业的出路在于改革。

——农村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从实际出发,取直过去走过的弯路。一是解决剥夺农民问题,把剥夺的归还给农民(社员);二是使之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自1978年农村改革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人民公社已经消亡;土地承包期正在趋于长期化;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已经或正在通过家庭承包制,使社员的一份权益得到逐步落实。也就是把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分割为所有权和承包权,农民拥有的承包权可以抵押、出租,也可以在土地使用权市场出售,从而有利于土地的集中。至于供销社和信用社,政府已经确认将之还给农民,并真正办成为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乡村集体企业的经营承包制、股份合作制乃至改制,都有较大的进展。从长远看,乡村集体企业要政企分开,只有政企分开(或村企分开),才能使农民的民主权利和经济权益得到保证,合作企业才能得到发展。

——改革远未结束,把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真正办成农民(社员)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还需继续努力。

——极少数集体经营单位,已经发展成为留工宿舍经济组织,这开始

走向富裕。值得注意的是不断加强民主管理,维护社员的经济权益。这些单位也需要政府的支持。这样的单位有其特定的条件,不能要求大多数单位都能做到。

——需要大力发展符合国际通行的合作原则的新的各种合作组织,使之成为原有合作组织的参照系,以推动原有合作组织的改革。

——随着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我国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方式将相应发展。参加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有国营企业、合作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等等。但合作企业特别是供销合作社和合作金融组织将是农民家庭经营参加一体化的重要组织和载体。也就是说,在龙头企业中,需要特别重视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合作企业做发展。

——根据几十年的实践,我国农村应是多种所有制结构和多种经营结构并存。总之,是多元化,不是单一化。在边远山区,居住分散,地块零碎,从来也没有双层经营过,如农民愿意,也可考虑将土地改为农民所有;现在许多行政村的服务职能已大大弱化,正在向纯土地所有者演化,农民的经济权益得不到保证,因此,“双层经营体制”需要重新研究,需要村社分开,成立土地合作社,明确农民的退出权。把土地制度的选择权交给农民。

编著者

2002年元旦

2003年9月修改

第四篇

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农民小生产者对未来社会的一种美好幻想,它违反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有政权的力量大力维护,但经济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

第十一章 “大跃进”

从 1955 年下半年起到 1956 年底,中国农业集体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与此同时,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这说明“三大改造”的任务大大提前完成了。为此,毛泽东感到从未有过的“喜悦”。就在这一胜利即将来临之际,他又在着手策划更大的行动,按照他的想法,要不断革命。既然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新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利用刚刚建立的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中国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所策划的行动就是发动、掀起中国的“大跃进”,同时完成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变革。为了发动“大跃进”,他需要首先扫除思想障碍,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或者说批判“反冒进”。

在上一章:我们曾经谈到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的一段话:

现在摆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在 1956 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是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又说: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还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许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这说明,当农业合作化高潮已经形成一泻千里之势时,毛泽东认为

办法就是从批判右倾保守开始,发动“大跃进”。

第一节 “大跃进”在酝酿中

有三件事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件事。大约在 1955 年 11 月,毛泽东开始酝酿《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1 月中旬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召集华东、中南、华北、东北 14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农业发展问题。12 月 21 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农业十七条》征求意见,后来扩大为 40 条。在讨论《农业十七条》时,毛泽东提出到 1967 年的粮食产量不是国家计委原来计划的 3.2 亿吨,而是要达到 5.3 亿吨,超过原计划的 66%;棉花的总产量不是原计划的 5600 万担,而是要达到 1.2 亿担。经过多次讨论、修改,于 1956 年 1 月 23 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两天后,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包括农业合作化、农业增产目标及措施,还有发展林业、畜牧业、手工业以及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指标和措施。这个农业发展纲要提出振奋人心的粮食单产指标:①秦岭以北地区亩产达到 200 公斤;②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 250 公斤;③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亩产达到 400 公斤。

在最高国务会议讨论时,毛泽东讲了话。他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 10 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个远大规划,不仅包括农业,还要包括工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等。

第二件事。是 1956 年 1 月 14~20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以及重要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系统的负责人。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

周恩来从党面临的任务谈起,对知识分子队伍的现状、成长过程和政治、思想、工作状态做了详细分析。报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指示,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提出了 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毛泽东在会议结束的

那天(1月20日)到会讲了话。他说,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做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又说,我们国家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赶超,把中国建设得更好。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由周恩来主持进行了多次研究。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彭真等领导人在怀仁堂专门听了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报告。1956年2月2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中央调集了600多名各学科的科学家,用半年时间编写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195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关于征求《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意见的报告。这个纲要(修正草案)及附件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57项重要科技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提出了各门学科的发展方向,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上面讲的两件事都是在“三大改造”及“一五”计划行将完成之际提出的,目的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从当时情况看,制定两个纲要还比较慎重,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想法是:中国的速度应当搞得更快,反映了他急于求成的思想。特别是后来随着他的思想越来越离开实际,而不断修改规划的指标,这就不仅使纲要成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所作的必要准备,而且成为推动“大跃进”的手段。

第三件事。催促各部委和各地方加快建设速度。

在《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出台前后和关于知识分子问

项计划指标。于是在“提前工业化”的口号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专业会议上也纷纷提出建议,要求将原来规划的8~12年的任务提前到3~5年完成。在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政治压力下,国务院各部委对1955年夏季提出并经中央同意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指标进行了修改。其中,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4.75亿吨,比原规划3亿吨增加1.75亿吨;棉花产量达1亿担,比原规划增加4400万担;钢产量为2400万吨,比原计划增加600万吨;原煤将达到3300万吨,比原计划增加500万吨。不少经济部门还把原计划1967年实现的指标提前5年,改为1962年完成。但是,毛泽东对此还感到不够。从1956年2月14日起,毛泽东听取国务院各部委的汇报时,他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建设可以超过苏联前几个五年。其实我国“一五”期间工业增长速度已达18%,已经不低,但毛泽东仍不满足,他把从中国实际出发所安排的计划,一概看做是保守右倾,并加以批判。正是在毛泽东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之下,国务院各部委纷纷把12年的远景规划,改为提前5年完成。从此,急躁情绪开始自上而下地蔓延开来。

第二节 1956年的反冒进

一、出现冒进的苗头

由于远景规划一次次地修改,任务完成的时间不断提前,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不断加大,速度加快,投资不断加码,当年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达112.7亿元,比1955年增加30.4%。而各地和各经济部门要求的投资总额高达153亿元,后来更增加到180亿~220亿元,比1955年增长1倍。“二五”计划原定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477个,几个月以后就增加到800个,完成项目增至500个。在这种情况下,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经过冷静的分析,感到党内滋长着冒进的苗头。因此在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呼吁:要使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计划,不要搞盲目冒进的计划。

2月6日,周恩来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一起研究在即将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务会议上压缩计划指标的问题。周恩来说,现在各部的专